



2014年4月3日

星期四 甲午年三月初四

总第 6019 期

今日 8 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4
邮发代号:1-82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主办: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官方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kexuebao 腾讯: http://t.qq.com/kexueshibao-2008

www.sciencecn.com

3月30日,转基因作物违规试验的曝光,让种业基地南繁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种业“摇篮”“犯规”谁之过?

■本报见习记者 王珊

这两天,因为转基因作物违规试验的曝光,南繁,这个位于海南省的“中国优良种子摇篮”,一下子为国人所关注。

作为全国最大、最开放以及最具影响力的农业科技试验区,南繁利用海南岛南部典型的热带气候条件,承载着各省育种以及农业科研的重任。50多年来,全国选育的农作物新品种中,70%都经过南繁选育,每年来南繁进行育种试验和种子繁育的科研生产单位达700多家,来自29个省市区。

3月30日,海南省农业厅网站公布消息:在对南繁农业转基因作物执法检查中,发现13家单位的15个样品呈转基因阳性。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海南省农业厅在2009年和2012年的抽查中,也曾发现转基因试验未登记的问题存在。不过之前未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历年执法行动中都会检测到转基因试验作物,我们周围个别的科技人员也有过违规利用转基因作物进行试验的行为。”4月2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

所研究员、农业部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黄大昉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多年来,黄大昉一直在南繁做转基因试验研究。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南繁尚未出现因违规种植转基因作物而引起的重大安全事件。然而,对于作为我国重要育种基地的南繁来说,“违规种植有着很大的安全风险”。

对此,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正斌也指出,违规进行试验,种子来源不清楚,加之南繁地区的特殊性,可能使该地成为基因“染缸”,威胁当地育种材料的多样性和农作物生产安全。

另外,还有公众质疑:执法检查于去年12月底进行,而通报结果却在3月30日。为何执法结果要在三个月后才通报?

对此,农业厅某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执法检查过后,须将样品送交专家进行检测,对一个样品进行检测可能需要半个月到二十天左右,而完成对所有样品检测所需要的时间更多。此外,结果出来后还要返还给农业部

进行筛选。“所以,三个月后通报结果很正常。”

对于违规试验的原因,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黄昆仑说,这很大程度上和科研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有关。“他们觉得自己的种子是安全的,所以不登记。”

不过,有专家向记者表示,政府在对转基因作物试验的申请和研究流程方面卡得过死也是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的单位在生产性试验结束后,可以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一切以拿到证书为准。”黄大昉强调。对于转基因试验,科技人员或者企业如果未获得证书,或者未能按照证书中计划的地点、面积开展种植,都属于违规操作。

一位在南繁从事育种的科研人员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违规进行转基因作物试验实际上和国家管得过严过死关系很大。“不管是在政策方面,还是在经费方面,审批工作的暂停会导致正常的科研没法进行。”

行。”

而资料显示,2007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数量为282件。然而自2012年至今,农业部没有再发布和更新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批准。

据悉,在此次执法行动中,违规的7家单位的9个试验作物已在属地农业执法人员监督下被依法销毁,涉事单位也受到了处罚。

“这些作物可能是好几代人的心血。”对于被销毁的试验作物,一位科研人员表示很痛心。

不过,黄大昉却认为,不能以“痛心”作为违规不受处罚的理由。“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法规确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其不能放松要求。”

对于需要改善的地方,他认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一般应当经过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三个阶段。“作为科研人员,我们希望上述三个研究阶段能更简化些,可以加速我们的试验进程,当然,关于试验的要求标准不能有任何降低。”黄大昉说。



4月2日,在北京中国国际低碳产业博览会上,工作人员在调试便携式空气滤清器和口罩。

4月1日,为期3天的第六届中国国际低碳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此次博览会以“接轨国际舞台 树立企业节能环保标杆”为主题,重点探讨和交流有关经济模式转型时期节能减排方式的经验。展会设置节能减排展区、建筑节能展区、供暖节能及锅炉展区、新能源展区等四大综合展区。

CFP 供图

“脑袋一拍,有了;胸脯一拍,定了;大腿一拍,糟了;屁股一拍,溜了。”政策制定如何避免“瞎拍”?中英专家建议——

将证据植入政策制定

■本报记者 丁佳

“脑袋一拍,有了;胸脯一拍,定了;大腿一拍,糟了;屁股一拍,溜了。”这段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常常被人们用来形容一些政府官员“炮制”政策的过程。

但随着政策议对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公众和媒体对政策背后的事宜依据也要求越来越严格,迫使政府开始思考政策制定如何更加科学,如何使政策更有效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服务,如何最大效率地使用有限的资源。

近日,“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中英比较研

究”研讨会在京举行。多位科技政策领域的专家济济一堂,探讨中英两国政策制定过程及证据支撑的经验与问题。

英国:理念倡导者

近年来,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越来越被欧美国家所推崇,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将证据植入从政策制定到政策评估的整个过程,以确保政策的合理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英国政府是这一政策体系形成的重要倡导者,早在1997年,布莱尔政府就提出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理念;1999年,英国政府在政

府现代化》白皮书中,明确要求政策应该是“前瞻性并基于证据的,而非迫于短期压力并不针对症状的解决方案”。

“英国提出这一理念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制定往往根据选民的意愿来定,很多之后都无法落实,反过来又导致选民对政府产生很大意见。”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李群说。

为了解释英国的实践与经验,更好地推动中国政策制定的科学化,英国繁荣战略基金项目“低碳经济: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中英比较研究”于2013年启动实施。李晓轩希望,他们能通过两国的对比研究,揭示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

学术服务能力,增强对科技工作者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树立“学术为本”的发展理念,探索学术交流活动的规律,不断提高学术交流活动质量和水平。要健全学术评价机制和学术规范,培育专业学术服务队伍,以促进学术服务能力的提升。

李静海介绍了学科进展情况,并指出了未来学科发展趋势:完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化学科基础;把握学科发展方向,支撑战略新兴产业,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努力突破社会发展瓶颈;加强前沿技术研究,强化自主创新后劲。

陈运泰介绍了2014年中国科协科技期刊的发展状况。目前,中国科协及其所属全国学会主办的科技期刊达1056种,占全国科技期刊的21.3%。

据介绍,本次发布会是中国科协举行的第7次学术建设发布会。

本报北京4月2日讯(记者潘希)2014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申维辰,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海,中国科协荣誉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出席发布会。会议由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沈爱民主持。

申维辰在会上指出,建立年度学术建设发布制度是中国科协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这项制度为推动我国学科发展,促进学术交流,传承学术文化,同时推动学术共同体建设,形成学术纲领和学术制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强调指出,要加强学术建设,实现“三个引领”:发挥独特优势,引领学科持续进步;搭建学术平台,引领学术交流繁荣;提升学术服务能力,引领学会创新发展。要进一步夯实学会发展基础和竞争实力,探索建立学会学术交流创新机制,提升学会的学术公信力和

智利当地时间4月1日20时46分(北京时间4月2日7时46分),智利西北部海域发生强烈地震,智利官方公布的震级为8.3级。截至记者发稿时,地震已经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了区域海啸,对当地造成了一定影响。不过,根据监测结果分析,国家海洋局海啸预警中心判断,本次海啸过程已经结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邓起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智利此次8级以上地震以全球第二次地震活跃期为背景,全球未来几年还会有8级与9级以上的地震发生,中国要警惕青藏高原断块区中部巴颜喀拉块体在这个高潮下发生7级与8级左右的地震。

据了解,智利是全球有记载的超级地震的多发地,在全世界平均每年记录到的9000次地震中,有21%发生在智利。1960年5月22日该国发生的里氏9.6级地震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最大的地震,震后形成了1000多公里长的破裂断层;2010年2月,智利8.8级大地震与同时引发的海啸,导致802人死亡、近200万人受灾,其中遇难者大部分死于海啸。

国家海洋局海啸预警中心首席预报员赵联大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监测结果显示,地震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了海啸,对智利北部沿海造成了灾害性影响。根据国家海洋局接人的全球潮位监测网的数据,智利、秘鲁沿海都监测到海啸波,最大的超过两米。

“这次海啸波影响范围就在震源附近几百公里内,传播几个小时后,海啸波的能量就消散殆尽了。”赵联大说。

据邓起东介绍,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的智利,处于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洲板块碰撞区域的边界上,纳斯卡板块向东挤压、俯冲和南美洲板块碰撞产生了智利地震带,“由板块碰撞挤压形成的安第斯山脉从南到北都是一个强震带,该地7级以上、8级以上地震频繁发生”。

邓起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全球历史上有两大地震活跃与高潮期,分别是1950年到1965年与2001年至今。前一个高潮期围绕着三次9级以上地震发生了诸多7级与8级以上地震;在第二个高潮期内,已经发生了两次9级以上地震。

“虽然第二个地震高潮期的总能量不如上一次,但是高级别地震的次数已经超过了上一个高潮期。”邓起东表示,“全球范围内要警惕板块边界区域8级与9级以上地震的发生,位于板块内部的青藏高原地区也要警惕7级与8级以上地震。”

上海隆重颁发科技奖项 金东寒、何积丰院士获上海科技功臣奖

本报讯(记者黄辛)4月1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动力机械工程专家金东寒,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计算机软件科学家何积丰获“科技功臣奖”。

此次大会共授奖298项(人),授予金东寒和何积丰科技功臣奖。此外,本次大会还颁发自然科学奖29项、技术发明奖43项、科技进步奖224项,授予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德国籍超导电子学专家张懿国际科技合作奖。

另据了解,此次奖励中,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员数量占获奖人员总数的62%。其中,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复杂疾病遗传机制研究中若干关键算法的研究与应用”的第一完成人——上海交通大学师晓勇博士年仅34岁,是本次一等奖获得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新型特船从无到有的历史,使我国特船技术水平、综合性能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何积丰是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著名计算机软件科学家。他长期从事计算机软件复杂性、正确性和可靠性等问题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是程序统一理论创立者、数据精化完备理论奠基者、可信软件设计理论与技术开拓者。

另据了解,此次奖励中,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员数量占获奖人员总数的62%。其中,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复杂疾病遗传机制研究中若干关键算法的研究与应用”的第一完成人——上海交通大学师晓勇博士年仅34岁,是本次一等奖获得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作为中船重工第七一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的金东寒曾深入研究多缸特种发动机的基础理论,突破了特种发动机及其动力系统关键技术,主持研制的我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种发动机及其动力系统,开创了我国

“我们国家在一些领域,存在着‘懂的人不说,不懂的人瞎说’的现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航坦言,“再加上媒体的炒作,使公众不能获得全面信息,不能理性、客观地认识问题。”

以近几年波澜不断的核能为例,在2012年的江西彭泽核电事件中,由于彭泽县未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使其毗邻的望江县对核电站及其建设情况缺乏了解。同时望江县政府在民意调研、科普宣传等方面的工作不足,导致当地居民对核电认识程度较低,影响了核电建设的进行。

而在英国,该国政府近年来积极采取措施消除民众疑惑,宣传核电站的安全性、公布项目细节等,取得了一定效果。在英国政府公开8个新建核电站候选地址以挑选最佳厂址的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参与比较积极,政府收到了大量的民众建议,为厂址的最终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

李晓轩建议中国在核能政策执行过程中,应加强对当地及周边公众核电知识的普及,同时在决策时扩大执行主体范围,充分考虑公众意见。(下转第2版)

邱锐

○主持:张林 邱锐 ○邮箱:rjtu@stimes.cn

近一段时间,随着《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被公布,保定承接首都行政事业等疏解功能被披露。事实上,不光是保定,廊坊、石家庄、唐山等多个城市在京津冀一体化上的角色也得以界定。与此同时,北京和天津也正在做相关规划。如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正伟曾表示,今年北京将首部核心职能向京外疏解。

对上述地方政府的举措,有评论认为,这些规划如果能够得到落实,将可解决困扰北京多年交通拥堵、人口膨胀、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

从理论上来说,这一观点正确无误,因为城市病的根源在于资源不足,即“僧多粥少”,而解决途径也无非两个:增加资源、减少人口。而在目前特大城市资源开发潜力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将人口转移。

但问题在于,人口容易被转移吗?或者说,通过将“非首都核心产业职能”转出北京的措施,就能把“人”转出北京吗?

笔者认为,或许答案不容乐观。在我国目前发展情况下,北京等特大城市具有极强的人才吸引力,而仅仅通过行政的力量,很难与这种吸引力相抗拒。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生源的高考入学率比许多省份要高很多,所以,为了孩子的未来,相信很少有家长会选择搬出北京。

因此,在各种资源还远未均衡的情况下,即便在行政力量下,这些人口的工作地点移出了北京,却还会被北京的各种优势所吸引。其实,北京亦庄也曾被作为人口疏解地,但至今,该地虽已集中了五百多家企业,却仍没有有效地起到疏解人口的作用,倒几乎成为有业无市的“睡城”,原因即在于该地忽视了生活等基础配套措施的完善。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资源的不均衡,还导致居民“职住分离”的产生,使人口往来中心城区的频率增加,不仅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更加重了北京的交通拥堵程度。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如果河北相关城市没有能够满足入迁人口的生活、教育、医疗、娱乐、文化需求,那么他们只能是通往北京高速路上的奔波客而已。基于此,各地政府在抓紧建设办公设施的同时,更应推进包括户籍、住房、土地、社保、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资源的一体化,注重实现“职住平衡”。最终,让进入京津冀每个城市的居民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享受现代城市文明。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疏解北京人口、缓解大城市病的目标。